

孙武军事经济思想评析

潘 明 德

作 者 潘明德, 军事经济学院马列教研室讲师, 武汉, 430035。

关键词 孙武 军事经济思想 取用于国 因粮于敌

提 要 本文从战争的起源、军需供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条件这三个方面对孙武的军事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评价, 认为: (1) 孙武的战争起源观虽属心理主义范畴, 但与纯粹心理主义又有区别; (2) “取用于国, 因粮于敌”的军需供应观是孙武军事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3) 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条件的认识使孙武的军事思想由一般的战术层次跃升到了战略高度, 并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孙武字长卿, 春秋末期齐国人, 出身于将门望族之家, 青年时即有志于兵事, 长于击剑, 曾以自著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吴王读后“知孙子能用兵, 卒以为将”。孙武为吴国的图强争霸立下了卓越战功。公元前 512 年冬, 他同伍员 (伍子胥) 一起率兵灭了钟吾国 (今江苏宿迁东北) 和徐国 (今安徽泗县), 随后又与伍员协助吴王积极图谋大举攻楚。公元前 506 年, 孙武与伍员随同吴王率军攻楚, 以 3 万人破楚 20 万军队, 攻入楚都郢 (今湖北江陵北)。《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 入郢, 北威齐晋, 显名诸侯, 孙子与有力焉。”孙武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 总结了春秋末期以前的作战经验, 揭示了战争的一些重要规律, 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思想。他的军事经济思想则是他整个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富则生战的战争起源观

孙武对战争起源的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属于心理主义的, 但与纯粹的“心理战争论”不同, 他不仅把战争的起源归结为心理原因, 而且还进一步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好战心理的产生。他认为战争之所以发生, 是由于统治者骄纵奢侈, 好大喜功的结果, 而统治者之所以骄纵奢侈、好大喜功, 又是由于厚赋敛、聚财富的结果。因此, 实质上, 孙武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战争起源的。他在回答吴王关于“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 孰先亡? 孰固成?”时说: “……其田疇 (狭) 置十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 置十多 主忝 (骄) 臣奢 冀功数战 故

曰先（亡）……”^④。这里的伍税指“五分抽一”，即“十分抽二”的税率，而传统税率为“十分抽一”，因而实行伍税制等于将税率提高了一倍。由于税重，国家敛聚的财富必然增多，因而肯定富裕。国家富裕，用于军队建设的投资就会增加，征集的士兵就多，于是乎主上骄纵，臣下奢侈，好大喜功，结果必然屡兴战事。战争就这样在一种骄纵奢侈、好大喜功心理的驱使下发生了，而形成这种心理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厚赋敛的经济政策。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用私有制因而也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战争起源的，因此，从表面上看，孙武的战争起源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起源观颇相似。实际上，两者存在着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产生了，不同阶级与社会集团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相互之间必然要发生矛盾，战争正是这种矛盾的爆发式解决。因此，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释包含以下两层意思：第一，战争是由经济因素引发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不同阶级与社会集团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相互之间必然要发生矛盾，战争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第二，这一经济因素归根结底是生产力，也就是说，战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孙武用来解释战争起源的经济因素只不过是一种具体的经济行为，这一经济行为本身还需要用其他东西来加以说明。更主要的是在他的解释中，厚赋敛的经济行为还只是铸造好战心理的因素，而不是直接引发战争的因素。因此，孙武虽然也是用经济因素解释战争的起源，但在这一点上并不能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孙武虽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但他并不主张国家过份发展军事力量，屡兴战事。因为战争的消耗十分巨大，“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⑤。他认为，屡兴战事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非进行战争不可，也要慎重对待。他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⑥。由于战争是骄纵奢侈、好大喜功的心理引起的，而这一心理又是由厚赋敛的经济行为铸造而成的，因而要制止战争，就必须薄赋敛，减少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这样，国家就贫穷，随之征集的士兵就少，于是主上就会整肃，臣下就会守法，由此而得以控制富人，国家就能巩固。“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令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⑦。这里所说的“公家贫”并非指国家的绝对贫穷，而是指国家不要过份敛聚财富，以免过多地投资于军队建设，增强军事力量。孙武关于国家不要过份发展军事力量、屡兴战事的思想，是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要求发展生产，在政治上要求施行仁政愿望的反映。

孙武把战争起源归于骄纵奢侈、好大喜功是不正确的，但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已有所认识。尽管在孙武看来，导致战争发生的直接因素是好大喜功的心理，但由于他又认为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是厚赋敛的经济行为，因此，这无异于说，战争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武进一步认为，要制止战争，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从经济入手，消除或者削弱滋生好大喜功心理的经济因素，釜底抽薪。当然，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主要的不是表现在战争的具体发生与如何制止战争上，而是表现在经济因素对战争的胜负所给予的决定性影响上，关于这一点，孙子也有所论述，后面还要涉及。

二、“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需供应观

在孙武看来，造成战争对财力巨大耗费的原因之一是远距离运送粮草。因为远距离运送粮草必然造成军队的后勤供应困难，这样，在军队驻扎的附近地方，东西就会涨价，东西一涨价，用于后勤保障的军费就会大大增加，财富就会加速消耗掉，因此，国家的财政必然发生困难。这就是他所说的“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殫，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蔽橰，丘牛大车，十去其六”^①。另外，远距离运输，途中损耗必大，他不无夸张地认为，20钟粮食要损耗掉19钟，只能到达1钟；20石饲草只能到达1石。这就给远征性质战争的后勤供应提出了如下问题：怎样才能既避免运输过程中的巨大损耗，又不影响后勤供应？这无疑是孙武之前的每个军事家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他凭着自己的军事天才，通过总结长期的战争实践经验，提出了“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需供应观。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中的“用”指的是以武器装备为主的军用品。总的意思是指武器装备取之国内，粮草则取之于敌。这里的敌不单指敌军，还包括敌国。由于远距离运输，途中损耗很大，很难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因此，“因粮于敌”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孙武认为武器装备要取之于国内，而不能取之于敌军呢？对于这个问题，孙武没有专门回答，但我认为《什家注孙子遗说》里的解释不无道理：“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于人。器之于人，固在积习便熟，而适其短长重轻之宜，与夫手足不相，而后可以济用而害敌矣。吾之器，敌不便于用；敌之器，吾不习其利。非国中自备，而习惯于三军，则安可一旦仓卒，假人之兵，而给己之用哉？”的确，每个人都习惯使用自己的武器，因为他了解自己武器的性能，熟悉其操作方法，使用起来会得心应手。如果仓促使用别人的武器，势必会因为不熟练而影响战斗力。另外，春秋时期武器已经专门化了，需要较高的技术才能制造成功，因而不大可能存在于民间。因此，要得到武器只有打败敌军，而自己没有武器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所以，武器必须取之于国，而不能也不可能取之于敌。

对于孙武的这一军需供应观，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同时又要正确认识到它的局限。一方面，由于远征战争在当时封建统一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而远征战争所遇到的难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因此可以说，谁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有所作为，谁就在统一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权。孙武“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需供应观，对于解决当时远征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来说，的确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消除以前统治者由后勤供应问题而产生的对远征的恐惧心理，使得他们在觉得有必要远征时能够及时进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对于加速封建统一政权的建立过程肯定会起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将军队的后勤供应寄托在对敌国的掠夺上，不仅是一种转嫁剥削的做法，给敌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带来额外的痛苦与灾难，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那种毫无选择性的掠夺并不总能保证自己军队的粮食供应，只有像孙武自己所说的“掠于饶野”的情况下，才能“三军足食”，如果碰到穷乡僻壤，军队的粮食供应就成问题了。因此，军队的粮食供应也应该主要靠自己国家解决。不能想象一支无粮无草的军队战无不胜。其实，孙武对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他也说过：“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

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委积则亡”^⑧。只是他没有将这一认识贯彻到军队的远征上。

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条件

前面已经说过，孙武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天才，并不因为战争能为他提供施展这种天才的场所而对战争怀有癖好，相反，他似乎对战争并没有多少好感。在他看来，长战不如短战，有战不如无战。“速战速决”只不过是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时的较佳选择，而不是最高的军事理想。他的最高军事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⑨。这里的“全”即不战而屈敌之意，“破”即通过战争而胜敌之意。孙武从具体与总体两个方面论述了实现这一最高军事理想的途径。从他的论述看，虽然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但经济条件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首先，从每场具体战斗来看，孙武认为，要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理想，关键在于充分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因此，他非常重视战前的准备工作，认为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与战争准备工作的充分程度成正比，多准备，多胜利；少准备，少胜利；不准备则不胜利。“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⑩！“算”即战前准备的一个方面。当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十分充分时，就会造成一种锐不可挡之“势”，就像“转圆石于千仞之山”^⑪，“决积水于千仞之溪”^⑫，那样，在交战之前自然就已先胜了，这时再去求战，必定会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也就是所谓“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⑬。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如果应战，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至于要做好哪些准备，孙武并没有明确论述。但从他对决定战争胜败的五项基本因素的论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到这个问题。他在《计篇》里把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归结为：“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很显然，这实际上就是给战前准备工作所划定的范围。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理想，战前必须做好这五个方面的准备。在这五项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中，法即为经济因素，孙武说：“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⑭。对于“曲制”、“官道”、“主用”三者，曹操解释说：“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主者，主军费用也”^⑮。张预解释说：“曲，部曲也；制，节制也。官谓分偏裨之任；道谓利粮饷之路。主者，职掌军资之人；用者，计度费用之物”^⑯。尽管两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在释法为经济内容这一点却完全一致。由于古代军队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粮食供应与其它一些费用开支构成军队后勤供应的主要内容，因此，军事交通运输（粮路）自然也构成军事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从总体上看，孙武认为，要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理想，必须发展经济，打好基础，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与综合国力，造成敌我双方实力的悬殊，从而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孙武将这样的强国称为“霸”、“王”。他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蹙”^⑰。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在孙武那里，经济对于军事的基础作用自然也就被换成了土地对于战争的基础作用。他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⑱。度即土地面积的大小，量即仓廩的虚实，数即人力的多少，称即军事力量的强弱，胜即战争的胜败。如果说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孙武只是模

糊地认识到经济是军事的基础, 那么在这里, 很明显, 他已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一认识对于孙武的军事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使孙武的军事思想不再仅仅局限于战术层次上, 而且也具有战略意义。

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理想反映了当时的地主阶级既要求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 又不想为此付出血的代价的矛盾心理。作为一种理想, 确实很吸引人,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这一理想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第一, 当时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使得争霸战争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诸侯在这一潮流的驱使下, 是不会放过哪怕是一线成功希望的, 他们甚至怀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因此, 任何想避免战争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第二, 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需要很高的经济、军事条件, 而当时则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 孙武关于发展经济、增强军事实力,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 在今天对于我们尤具启发性。和平与发展虽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但世界并不太平, 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亡我之心不死, 我们唯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 打牢经济基础, 才能不断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与综合国力, 对敌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注 释:

- 1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④

孙子·吴问》
- (四)

孙子·用间》
- ¼ Å 13

孙子·计》
- ¼

孙子·作战》
- ⑧

孙子·军争》
- (七)

孙子·谋攻》
- 10

孙子·势》
- 11 12 17

孙子·形》
- 14 15

《一家注孙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 16

孙子·九地》

(责任编辑 邹惠卿)